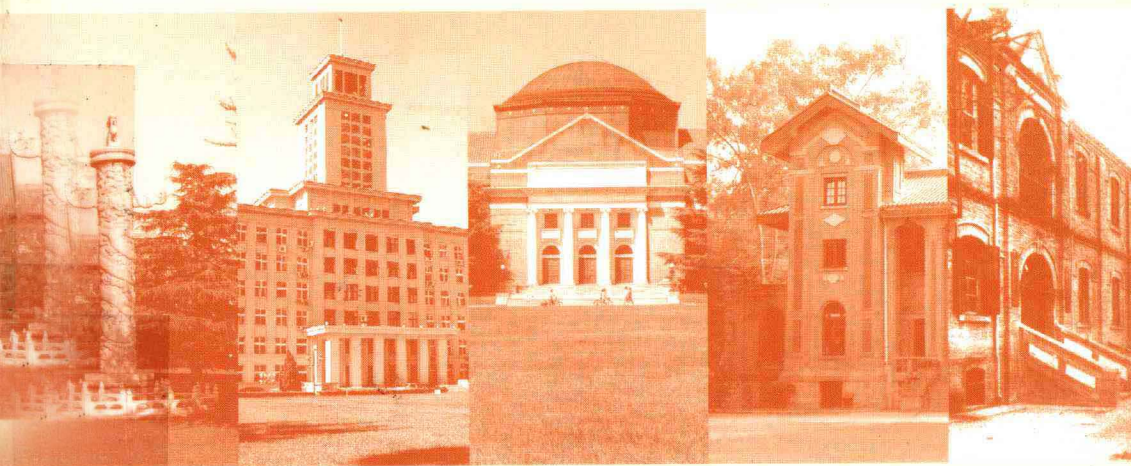


陈平原 著

老北大的故事

增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陈平原 著

老北大的故事

增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北大的故事 (增订版) / 陈平原著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9.5
(陈平原大学三书)

ISBN 978-7-301-15068-9

I. 老… II. 陈… III. 北京大学—研究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3964 号

书 名 : 老北大的故事 (增订版)

著作责任者 : 陈平原 著

责任编辑 : 高秀芹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15068-9 / G · 2590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 pw@pup.pku.edu.cn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 蔡立国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2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 fd@pup.pku.edu.cn

小 引

1929年底，刘半农为《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撰文，提及校庆文章之难写，称不外“说好话”与“说老话”两种。前者留给校长市长，方才显得“冠冕堂皇，雍容大度”；后者则最好出自真正的“老北大”之口，要不“说错了给人挑眼，岂非大糟而特糟”（《北大河》）。刘文借北大三院门前的水沟“起兴”，预想百年纪念会的情景；我则将关于校庆的诸多“好话”与“老话”作为解读对象，试图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图”上，寻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

我所深感兴趣的，不只是北大校史，更包括前人对于北大校史的叙述与阐释。校史上扑朔迷离的“故事”固然值得侦探，建构光荣传统的“神话”，同样值得认真剖析。所谓的“老北大”，并非一成不变的客观实在；每一代北大人，都在借校庆纪念之机，为其心目中的北大“添油加彩”。我的工作计划是，在品味日渐复杂的“老北大的故事”的同时，追踪这些故事的形成、流传与演变，以及制约着这一演变的社会文化因素。

这是一个有趣但并不轻松的话题。“老北大”确实个性鲜明，可圈可点的轶事甚多，只要态度虔诚，不难有“新发现”。既然如此，何以还有“并不轻松”一说？原因是：好玩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又很可能过于沉重。百年北大，折射着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遗憾。入口处是一则诱人的轶闻，出来时却很可能满脸灰尘。

此说并非故弄玄虚，百年中国，本来就不是容易谈论的话题。因学力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只好绕过了若干人所共见的“伤疤”——比如“文革”中的北大；即便如此，本书所呈现的故事，也并非总是“风和日丽”。

全书分为四辑，末辑乃书评，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学史的写作。其中《大学百年》和《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二则，是从我另外的著作转录来。之所以冒昧重收，因其与本书的写作大有关系。五年前，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时，买了一册印刷精美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1877—1977）》，读后感慨良多，曾撰文予以评述，顺带预测“北大百年史”的写作。至于为金耀基的《剑桥与海德堡》等书撰写评论，不只是因其曾为我的游览提供方便，更希望借此探讨将正襟危坐的校史与随意挥洒的游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一为学术思路，一为文章笔墨，二者的启迪，规定了我今日的探索。

第一辑虽分六节，原本只是一章，即《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1月）一书的“代序”。前年夏天，正式进入本课题，依照惯例，收集了大量相关史料。因不忍割舍，挑选其中若干有关“北大旧事”的篇章，集成这册被人看好的“奇书”。这种工作程序，乃模仿鲁迅，希望从事每一个课题，“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此文以《“太学”传统》、《校园里的“真精神”》为题，分两次在《读书》刊出后，颇获好评。访学美国时，曾以“老北大的故事”为题，在加州大学的柏克利、戴维斯、洛杉矶校区做专题演讲，也屡受欢迎。去年秋季开始，我在北大讲了一学期的专题课，以大学制度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与发展，“老北大的故事”依然是其中最吸引人的一章。当然，每一回的演讲，都是一种“重写”；不断扩张的结果，便是本书的成形。

进入90年代以后，我主要从事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撰写《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时，已经意识到学术思想与教育体制的关系非同小可，并略有切入。选择“老北大的故事”作为研究课题，首先是学术史的视野，而

后才是百年校庆的机遇。第二辑最能体现这一特色，也是作者最为用力之处。考辨校史上若干“疑案”，只是文章的切入口，真正关注的，其实是蕴藏在“故事”后面的思想史线索。校庆之改期、传统之诠释、校长的遴选、纪念册的编纂等，其内在涵义，绝非区区学校围墙所能限制。

首先是学术上的发现，而后才考虑叙述语调以及文章结构。总的思路是，以考据出故事，以故事出思想，以思想出文章。既然着眼点是学术，为何题为“故事”？除了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这一写作策略外，更希望沟通文与史、雅与俗、专家与大众、论著与随笔。在我看来，“大学”之命运，应该是所有文化人关注的对象，而并非只是教育家的专利。

第三辑诸文，乃去年春夏游学美国的意外收获。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不少此前不曾注意的史料，于是一鼓作气，在救护车的呼啸声中（住处邻近哥大医学院），完成了这八则短文。

本书的写作，从最初动议、收集资料到各章定稿，均得到夏晓虹女士的大力帮助。只是因夏君另有重任在肩，方才由我独力承担。另外，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得到北大图书馆、北大档案馆以及哥大、哈佛等校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读书》、《中华读书报》等报刊腾出宝贵版面连载拙作；北大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的学术史研究专题课捧场，所有这些，乃本书得以完成的主要动力，仅在此一并致谢。

1998年2月18日与京北西三旗

目 录

小 引	1
-----	---

◀ 第一辑 北大旧事 ▶

校园里的真精神	3
哥大与北大	28
北大传统之建构	52
老北大的自画像	
——“校庆感言”解读	66
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历年“纪念册”述评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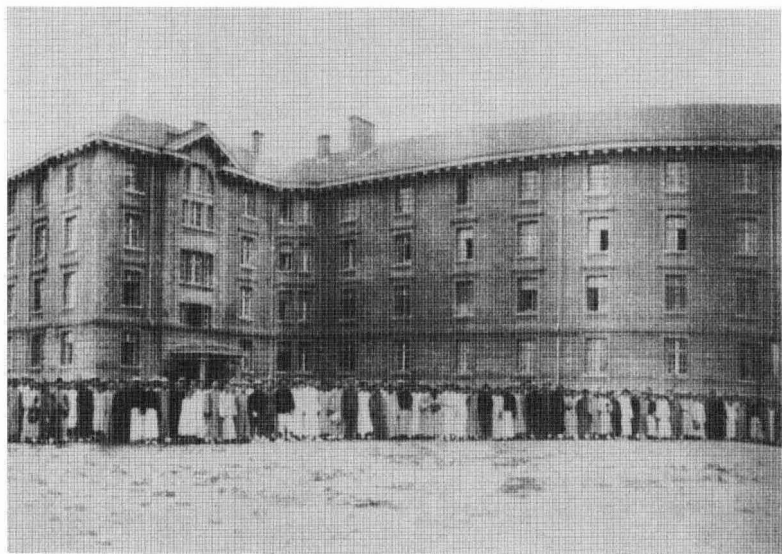
◀ 第二辑 校史杂说 ▶

北京大学：从何说起？	95
北大校庆：为何改期？	105
北大校名：如何英译？	116
北大校史：怎样溯源？	122
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	
——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	130
不被承认的校长	
——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	138
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	
——严复与北京大学	153

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	247
“为了蔡先生的嘱托”	
——《蔡元培年谱长编》读后	251
“触摸历史”之后	255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259
附录：《北大精神及其他》序	264
增订版后记	268

第一辑 ►

北大旧事



北大红楼

校园里的真精神

永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没关系，“无巧不成书”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校园风景线”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

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机缘。我的最初动因，竟是闲聊时的“争强斗胜”。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来，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为有在别的大学就读的经验，我对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不只表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评判标准既充满敬意，又有点不以为然。试着虚心请教：让你们如此心迷神醉的“我们北大”，到底该如何描述？有眉飞色舞，抛出无数隽语轶事，令人既惊且喜的；也有引经据典，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蔡元培到毛泽东，让我重新回到现代史课堂的。后者可以帮助确定北大在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只是叙述姿态过于僵硬；前者补阙拾遗，而且引人遐想，可惜传说多有失实。

希望能够兼及“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散落各报刊，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

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40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副蔡子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1898—1937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于习惯新旧对举、时时准备破旧立新的人来说，只要与“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称为“老北大”。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为本文所不取。为了叙说方便，本文将“老字号”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

京师大学堂。

从1918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北大老”与“老北大”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法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得走不动的；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40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

上大作文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等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1948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重要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至于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提醒读者，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了无干系。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学”。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